

## 第一章 北美经济圈的来龙去脉

“冷战”结束后，欧共体不再需要美国保护，从而使乌拉圭回合谈判几乎以美欧破裂而告终；90年代日本不但成了经济大国、贸易大国，而且逐渐走向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而美国却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和债务国，美国人的“美国梦”逐渐破灭。为了力挽颓势，美国在与加拿大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又拉墨西哥同它们共组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交错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 一、乌拉圭回合谈判突爆冷门

1990年12月3日，美国指挥下的多国部队云集海湾地区，加紧进行对伊拉克开战的准备工作。同一天，美国总统布什出访南美洲国家，第一站就是乌拉圭。也在同一天，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布鲁塞尔开幕，准备按计划结束历时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100多个国家对此翘首以待。

1986年9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乌拉圭首都埃斯特角召开。会议的主角美国、欧共体、日本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打破了各方在农产品贸易和劳务贸易问题上的僵局，发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部长宣言。这个宣言规定了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内容：（1）货物贸易谈判，其议题主要有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热带产品、自然资源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农产品；（2）体制问题谈判，其议题主要有修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条款问题、保障

条款问题、争端解决问题、贴补和反贴补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冒牌货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总协定体制的作用；(3) 服务贸易谈判。

服务贸易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一次列入谈判议程的，原以为一定比较棘手。可是由于当时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问题掉以轻心，在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下，放弃了反对将这个问题列入议程的立场，因此各方谈得比较顺利。各方初步承诺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并达成减让表，拟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草案。

关税谈判的目标是要使成员国关税在1986年9月的税率基础上平均降低33%。然而，不到半年美国与日本就爆发了关税战。1987年3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宣布：为了报复日本对美国倾销集成电路芯片、歧视美国半导体产品的行为，美国将从4月17日起对日本出口到美国来的彩电、电动工具、私人电脑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这是美国又一次对自己的盟友日本实行制裁威胁，日本首相中曾根称之为“扎在小指上的一根一碰就痛的刺”。4月中曾根紧急出访美国，以扩大内需、进一步向美国开放市场为条件，恳求里根不要制裁日本。6月中曾根到意大利出席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带来了里根一份日本政府拟定的增加公共开支和减税429亿美元的《应急经济对策》。作为回报，里根在会议开幕前宣布将征收100%惩罚性关税的日本电子产品减去17%。10月，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举办促进进口月，使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增长率达到3%。11月，里根宣布将征收100%惩罚性关税的日本电子产品再减少28%。

非关税措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良方妙药，因此谈判的主角借口海关估价、进口许可证手续、贸易的技术壁垒、反倾销措施等在东京回合谈判中已有规定，而把谈判的重点放在装船前检验和原产地规则这两个问题上，至于那旨在“减少或取消包括数量限制在内的各种非关税措施”的谈判目标则被束之高阁。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领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内建立一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便运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解决争端机制中的报复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它们还指责发展中国家关于当地生产成分要求、当地制造要求、贸易平衡要求等投资意图抬高了市场准入标准，要求予以禁止。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农产品问题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内战”。美国要求以1986年为基期，10年内把农产品生产和出口补贴削减70%以上，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4个农产品出口国组成的凯恩斯集团要求在10年内把农业生产补贴削减75%，把农产品出口补贴削减90%。然而，欧共体只同意10年内削减农业生产补贴30%。美国和凯恩斯集团为一方与欧共体为另一方发生了弄得面红耳赤的争吵。

美国在农产品贸易战上，并不比欧共体温良恭俭让。1982年它以每吨低于市场价25美元的价格卖给埃及100万吨面粉，夺走了欧共体的传统市场；1985年它又用100万吨经过补贴的廉价小麦，争夺欧共体的另一个传统市场——阿尔及利亚；1986年它又宣布今后谁买它的农产品，它就用价值10亿美元的政府农产品对其进行实物补贴。可是，美国的补贴能力不如欧共体大，长期竞争下来就显得力气不支了。1987年欧共体出口一吨粮食补贴290西德马克，美国只能补贴不到200西德马克；1980年至1986年期间，美国每年用于农业补贴的钱约在250亿美元左右，而欧共体则达到260亿美元。美国也曾采用高关税政策同欧共体竞争，例如1985年以西欧对美国柑桔采取了歧视性政策为借口，将来自西欧的各种面食品的关税从1%提高到25%至40%。欧共体立即实行报复，将美国柠檬和胡椒的进口关税从8%分别提高到20%和30%。欧共体还宣布限制美国大豆和玉米的进口，美国则对法国的洋葱、意大利的西红柿酱实行报复。

1988年12月，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委员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开会，美国同欧共体继续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1989年2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在美国和欧共体之间进行了穿梭斡旋，才使双方在4月召开的日内瓦续会上达成了“逐步实质性地削弱农业补贴”的妥协方案。接着，邓克尔宣布：从1989年5月起，乌拉圭回合谈判全面进入实质性阶段，以便如期实现谈判的目标。

然而，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衰落，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后，布什总统开始企图用政治压贸易，迫使欧共体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对美国作出让步。1990年10月欧共体各国为美国筹划的海湾战争出兵出钱，坚定了布什的这一构想。因此，美国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对欧共体转入了攻势。欧共体见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终期会议已经临近，只好背水一战，同美国硬顶。结果到终期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可供双方部长们讨论的成熟方案，把邓克尔急得团团转。

布什为了在终期会议上迫使欧共体妥协，又走了两着棋：一是他届时出访乌拉圭等南美洲国家，显示美洲国家团结一致地反对欧共体的阵容；二是让瑞典到时在终期会议上提出一项有利于美国的折衷方案，美国和凯恩斯集团14国则予以支持，形成压欧共体不得不妥协的氛围和气势。

布什万万没有想到，在12月6日夜里的会上，欧共体12国的代表竟是不吃美国和凯恩斯集团的“罚酒”，一致拒绝了瑞典代表提出的折衷方案，终期会议不得不暂时中断。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暂时中断，使布什既恼火又吃惊。他突然发现，东欧剧变、苏联衰落后，一个强大的欧共体已经羽翼丰满。它在军事上不再需要美国保护，经济上正在走向更广泛的联合，形成一个自称为欧洲各国的对内没有边界、对外森严壁垒的“大市场”。因此，海湾战争还是打得天翻地覆之时，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却突然于1991年2月5日向全世界宣布：它们将尽快开始举行贸易谈判，以创建北美自由贸易区。

## 二、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

美国果断地决定推出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同日本 80 年代后半期以来经济实力迅速膨胀，对美国的威胁越来越大不无关系的。1971 年至 1987 年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 2.4%，而日本为 4.4%；1970 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 6.3%，1980 年和 1989 年已经分别上升到 8.9% 和 12%；1988 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2.3 万美元，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1990 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为 21020 美元，也大大超过了美国 19840 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额，跃居世界第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仍居世界第一，但 80 年代以来增长速度一直慢于日本：1980 年至 1985 年，美国为 2.7%，日本为 3.8%，日本高于美国 1.1%；1985 年至 1990 年，美国为 3%，日本为 4.6%，日本高于美国 1.6%；80 年代后半期与前半期，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同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政府知道，如此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日本将在国民生产总值上也超过美国。

国民生产总值竞争的基础是工业实力的竞争。1992 年发表的法国 CEPII 报告指出：从世界九个主要工业部门看，美国从 70 年代至 80 年代末一直保持优势地位的只有电子工业、木材造纸工业和机械工业，而日本则在电力器材工业方面跃居世界榜首，在建材工业、汽车工业和基础金属工业方面超过美国，在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逼近美国。当年靠引进美国技术起家的日本电子工业，1988 年创造的产值超过了汽车工业，成为日本的第一大产业，其生产的半导体产品和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 50% 和 80% 左右。

随着日本劳动生产率接近和超过美国，日本和美国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上升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 1966 年至 1973 年期间，日本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上升率为 7.9%，美国为 5.5%，日本高

于美国。可是，到1973年至1985年期间，日本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上升率为5.9%，美国则上升为6.9%；1985年至1990年期间，美国的单位产品劳动成本上升率降为3.9%，日本则降至1.1%，依然把美国甩在后面。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迅速降低，使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迅速增强，一方面使出口额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导致进口替代产业生产能力扩大，使部分国内需求从进口产品向本国产品转移，促进了进口需求的下降。因此在1974年至1992年期间，日本对外贸易收支除了1979年逆差24.38亿美元外，其余年份均为顺差。从1981年开始，日本对外贸易收支顺差额每年都在200亿美元之上：1981年为203.58亿美元，1982年为201.41亿美元，1983年为345.46亿美元，1984年为456.01亿美元，1985年为616.01亿美元，1986年为1016.48亿美元，1987年为940.34亿美元，1988年为953.02亿美元，1989年为699.99亿美元，1990年为698.64亿美元，1991年为1136.83亿美元，1992年为1361.09亿美元。而美国从1974年开始，对外贸易收支年年逆差，从1976年开始年年逆差百亿美元以上，从1984年至1990年期间对外贸易收支年年逆差千亿美元以上：1984年为1125.10亿美元，1985年为1121.50亿美元，1986年为1450.60亿美元，1987年为1595.60亿美元，1988年为1269.60亿美元，1989年为1156.80亿美元，1990年为1088.40亿美元。1991年和1992年美国对外贸易收支状况有所改善，但仍然分别逆差734.40亿美元和962.80亿美元。

日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但成了世界上的经济大国，而且具备了操纵世界经济的实力。到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91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1989年日本收购、兼并外国企业659家，其中30家属于美国最大的公司；1989年日本的海外投资收益达到1017亿美元，日元成为全球外汇市场上仅次于美元的主要交易货币。从1987年开始，日本的国民总资产（含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开始超过美国，1988年年底达到5993万日元，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首富。1988年，国际金融资本中的85%来自于日

本。1989年，日本银行在世界200家最大的银行中，包揽了股市价格的前10名。1989年4月，日本的外汇储备突破了千亿美元大关。1991年在世界机器和金属业的10家大公司中，日本占了4家；在世界10家大建筑公司中，日本占了7家；在世界10家大运输业公司中，日本占了3家；在世界10家大电气业公司中，日本占了3家。1990年1月，日本向月亮发射了第一个空间站，成为第三个能向月亮发射火箭的国家。

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急剧膨胀，日本同美国的政治摩擦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增无减。1989年1月，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日本可以说“不”》，该书成为日本当年的最畅销书。该书认为日本已经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在美国的指挥棒下唯唯诺诺了，因为日本不但经济实力超过了美国，而且它的科学技术已经发达到使美国不得不反过来依赖它的程度。只有日本才能生产装有100万条超集成线路而面积只有小指甲的1/3大小的硅片，不管美国的军事实力如何强大，只要日本停止向它出售这种计算机芯片，美国的高科技武器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该书认为，美国政治家敢于恫吓日本，除了他们为了拉选票外，主要是因为日本自己太软弱了。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研制新一代战斗机的计划，就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告吹了。该书不否认日本在基础技术领域大量应用过美国的专利，但它说这恰恰是日本人的创造性之所在。美国人只会倒股票和有价证券，却在技术应用和商业销售上缺乏创造性。美国人自认为是白种人创造了现代社会，这正是促使他们不断地“敲打”日本的种族偏见。这种偏见反映了他们对美国即将夕阳西下，而日本却如旭日东升、喷薄直上这一趋势的焦躁不安。

《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一出版，立即被美国国防部译成英文。它不但发给了白宫的每位官员，而且被美国国会列为正式参考材料。美国新闻媒介纷纷指责这本书是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强烈表现，公开表明了日本企图凭借其高科技优势来称霸世界的

战略构想。

1990年5月，石原慎太郎我行我素，同渡部升一和小川和久合作推出《日本就是敢说“不”》，作为对美国新闻媒介指责的回击。该书首先攻击了日美战后关系的基础——《日本国宪法》和《日美安全条约》，说：1945年8月15日《纽约时报》曾经在醒目的位置下刊登了一幅漫画，画中一个美国大兵正在用钳子把画成怪物的日本的牙齿拔掉，可是，美国拔掉了日本的牙齿后又装上了两颗假牙，这就是《日本国宪法》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把日本变成了一个宦官式的没有自立精神的国家，模糊了天皇的地位和身份。日本要抛弃美国强加的这个宪法，为天皇正名，在新宪法中明确规定日本也有自己的国家元首，这就是天皇。后者把日本纳入了美国的世界战车，把日本变为可以满足美军在半个地球上作战所需石油的贮油库。可是，日本政府每年编制预算时，却还要拨出专款，分担驻日美军的经费。如果加上美军基地占用的私人土地的地租、噪音赔偿费和国有土地的无偿使用费，日本国民负担的美军费用高达4000亿日元，相当于驻日本美军费用的40%。日本花钱雇美军来控制自己，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美国国防部读了这本书后，反唇相讥说，驻日美军作为防止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制动器”，今后仍然要在日本驻扎下去，迫使日本继续对美国俯首称臣。

1991年5月，石原慎太郎又出版了《日本坚决敢说“不”》一书，并冠以副标题：“战后日美关系的总结”，同美国对骂，批评美国在海湾进行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其目的在于通过牢牢地控制石油价格体系，继续统治世界。而日本政府却轻信了美国关于海湾战争是为了维护正义的谎言，竟无条件地向它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军费，占整个海湾战争开支的1/4。实际上，日本即使作为美国的盟国也没有为其提供军费的义务，因为美国能打赢海湾战争全靠了日本的电子技术。美国的现代化武器共使用了93种外国电子装置，只有1种是英国生产的，其余92种全是日本生产

的。如果没有日本的电子系统，就不会有爱国者导弹，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就会大量击中以色列，以色列就不得不进行报复。那样一来，叙利亚和埃及就会脱离多国部队，海湾战争就会陷入泥潭，害怕牺牲的美国军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

石原慎太郎强调说，日本已经具有左右世界的巨大力量，解决世界巨大难题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日本的身上，而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则已岌岌可危，现在轮到由日本来帮助美国治病了，因此日本绝对没有必要再向美国说“是”了！

以石原慎太郎为主撰写的这三“不”曲，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中第一本书在日本再版了 30 多次，发行量达到了 130 万册，后两本书也各印刷了数十万册，都成为了日本当年的畅销书。这使美国政府不能不感到担忧。

随着美国经济衰退的加剧，在美国投资的日本企业大批解雇白种工人，引起了美国上下的不满。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表示这是美国人懒惰、自我放纵、道德沦落、纪律松弛的必然结果，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美国一个参议员闻讯后大为愤怒，竟对记者说，我建议你们在报纸上登张蘑菇云的照片，下面注明：它是在美国制造，在日本试验的。这显然是在用核武器威胁日本。日本朝野对此爆发了更为激烈的反响，而日本右翼分子要求日本自行研制核武器，同美国的核保护伞分道扬镳的呼声又甚嚣尘上。1991年春天，美国出版了一本题为《未来的对日战争》的书，它预言：由于日本国民将支持复活军国主义，因此日美 20 年之内将重新爆发战争。该书说：“问题的性质与 1941 年那时一模一样，日本需要控制东南亚和印度洋盆地的矿产资源。它需要有一个能在政治上加以主宰的出口市场。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迫使美国撤出西太平洋。正如 30 年代那样，根据这一图景，紧张形势终将导致热战，美日将在战争中决一胜负。”

随着美日经济摩擦的加剧，日本政府对美国政府的离心倾向也日趋明显。1990年12月，日本政府提出的从1991年财政年度开

始的五年防务计划，一共支出了 1720 亿美元的巨款来扩充军备。

1991 年 1 月 30 日，日本外务省次官栗山尚一借在《每日新闻》创刊 119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的机会以《肩负大国的责任的日本》为题宣称：日本在美苏两极体制崩溃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其国际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国际作用将会越来越大，而这种变化又加快了世界多极化这一大潮流的发展。这样一来，日本如何作为支撑世界秩序的一极发挥作用和承担责任就更加成为全世界注目的大事了。过去日本只是适应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现在日本必须结束这种被动外交，树立自己的独立形象，确保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而不能再把建立国际秩序的责任交给别人，自己只沉湎于和平与繁荣之中就行了。

1991 年 11 月 5 日宫泽喜一出任日本首相后，突然提出了建立“世界和平秩序”的主张。由于这个主张同布什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概念不同，因此各国舆论界议论纷纷，日本国内也褒贬不一。宫泽喜一让经济企划厅政务次官田中秀征 12 月 7 日在《东洋经济》上发表文章，阐释自己这一主张的内容。

田中秀征写道，我作为与“世界和平秩序”这一构想的提出有密切关系的人我认为它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正在认真探索的“新的世界秩序”有三点微妙的不同：（1）它有明确的目标、信念和价值，即它所力争实现的是一种和平的世界秩序；（2）它不偏向于政治和军事，而是旨在建立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在内的综合性秩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明确无误的意图，这就是它力图摆脱其他概念中所带有的那种均势逻辑；（3）在它中间名副其实地处于中心地位的是联合国，而在其他概念中却是期望众所周知的大国特别是美国肩负起过大的负担和发挥核心作用，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说：在“世界和平秩序”规定的诸目标中，目前已经明确的起码有六个：（1）销毁核武器，全面裁军；（2）保护地球环境；（3）创设联合国常设部队，遏制地区性战争；

(4) 保护人权免遭暴政的压制；(5)对饥饿和贫困实行救济；(6)向毒品和艾滋病等导致全人类毁灭的因素展开战斗。他强调说：“世界和平秩序”并不是请谁来建立的，也不能坐等它的实现，而是要通过我们日本亲自发挥主导作用去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和平秩序”并不是在一国或者少数特定国家领导下确立的秩序，我们日本所要争取建立的不是世界帝国，而是世界共和国。由于日本目前已经处于历史的绝好地位上，所以宫泽首相使用了“世界和平秩序”这一新措辞，把为建立这种新秩序作出主导性的贡献视为日本国新外交政策的主要台柱来提出和强调。

这里，日本不但否定了美国的“新的世界秩序”的构想，否定了美国在建立和控制未来世界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而且要求美国销毁核武器，实行全面裁军，改变日本作为军事弱国特别是没有核武器的军事弱国的卑下地位；要求创设联合国常设部队，为日本向海外大举派兵提供合法机构；要求既以联合国为中心又在日本的主导下建立某种世界秩序，为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从而成为真正的世界政治大国铺平道路。

美国打的海湾战争吓倒了不少国家，而日本却凭借自己迅速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不为海湾战争所动，与美国安排世界新秩序的战略意图分庭抗礼，这不能不引起白宫的高度警惕。白宫还注意到，日本1989年在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是美国的2.2倍，1990年日本对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家的贸易额已与美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持平；与此同时，日本资本加速进军墨西哥，投资总额比10年前增长40%左右，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投资国。这更促使白宫下决心创建北美自由贸易区，遏制日本对美国势力范围的经济扩张。

### 三、美国经济衰落积重难返

经济实力由盛转衰是美国同日本和欧共体摩擦不断加剧的根

本原因。美国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早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中就提出：美国同它以前的其他大国一样，主要是靠经济成就走向世界霸主的宝座的。为了保住自己的霸主地位，美国不得不像过去的那些霸主一样把越来越多的钱用于军费开支，从而由于过度扩张而使经济实力下降。而经济的衰败迟早要导致军事与政治力量的衰败，因此两极体制的发展前景不可能是美国一家独揽世界霸权，而是逐渐形成包括日本和欧共体在内的五极体制。

《大国的兴衰》出版后，遭到许多憧憬于大美国主义时代到来的美国学者的反驳。约翰·奈斯比特和帕特里夏·阿伯迪妮在1990年出版的《2000年大趋势》一书中写道：

第一，美国并没有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增加军费。目前美国的国防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而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却占了10%。美国有越南战争的教训，对帝国过度扩张深有体会，不会重蹈覆辙。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欧洲和日本将会承担更多的国防开支，从而大大降低美国的海外军费负担，增加对国内经济的投入。

第二，美国工业产值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50年代的50%下降到目前的25%，也不足为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和日本惨遭破坏，美国工业产值才能在50年代的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占了那么高的比例。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美国的比例下降是正常的。何况，美国工业产值虽然占世界的25%，但它的人口只占世界的5%。

第三，所谓的日本人正在“购买美国”的问题也不值得可怕。外国人到1987年年底在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为2500亿美元，其中英国的比例最大，占28%；荷兰居第二，占21%；日本居第三，占12%。日本1987年在美国的投资为74亿美元，创了其历史纪录，但不及英国在美国投资的一半。1988年英国在美国的投资由1987年的151亿美元增加到215亿美元，日本由74亿美元增加到142亿。

美元，尽管增长幅度很大，但在美国的巨额经济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微乎其微的。而日本人发现在美国投资比在日本投资更为有利，这正是美国优越于日本的表现，有什么好惊慌失措的呢？

第四，美国的人口优势无可匹敌。日本是一个单一文化、单一历史、单一种族的国家。日本人的素质固然很好，但其条件有限，而美国却具有人口来源的多样性。1988年美国批准了64.3万的合法移民，比其他各国接收的移民总数还要多。他们都是些最有进取心、创新精神和坚强意志的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为了去美国，他们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再往远一些看，美国从1970年以来接收的合法移民就多于其他各国的总和。因此，美国出了188名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而日本只出了5名。这决非偶然。战后，发达国家的人口都在老化。正当美国人口出生率下降之际，移民给美国的人才库注入了宝贵的血液。欧洲国家的人口出生率比美国更低，其移民政策却不如美国。欧洲人口平均年龄最高的国家是联邦德国，其次是荷兰，再次是北欧各国，但它们却有世界上最严格的移民法。日本的人口也在迅速老化，但它也不准任何外国人移入。这样在90年代，美国将比它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拥有平均年龄更小的人口，成为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保持优势的重要条件。

第五，所谓的美国双赤字问题不过是凡夫俗子们的危言耸听。美国同过去的40年相比，它目前的预算赤字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美国的预算赤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并非远远大于其他西方国家。1989年美国的预算赤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2.6%，比1982年的比例减少一半以上。如果再把美国各州、县的预算结余加进去，美国联邦政府的赤字要远远低于日本、法国和联邦德国。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1986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实际上下降了57%，这个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低的。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把各种统计数字都加进去，美国对日本或者其他国

家实际上不存在贸易赤字。人们在计算美国所谓的贸易赤字时，只限于海关官员在进口港查验登记的货物，即工厂生产的有形产品。可是，当日本买了美国人写的书的版权后在日本翻译出版，这时美国作者不仅得到了版权费，还会收到版税，但这些收入一分钱也没有算进美日贸易额中去。而美国公民同外国人的这种交易每年要进行上百万次。美国的建筑、工程和咨询公司每年从世界各国收取几十亿美元的费用，也都没有用于填补所谓的贸易赤字。1986年美国的一些公司在日本生产又就地销售给日本公民的产品和劳务达到 810 亿美元，而日本公司同年在美国就地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劳务所获得的收入只有 130 亿美元。1986年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分公司销售了价值 7200亿美元的商品，相当于当年美国外贸赤字的 7 倍，而在美国进口的商品中，亦有 20%是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分公司生产的。

第六，与预算赤字相关的是美国1987年10月19日股市大崩盘所引起的美国人的恐慌。其实，股市经济是赌场经济，同国家的实际经济状况无关。预算赤字的上升和下降，都可能导致股票价格的上涨。1987年大崩盘前夕，预算赤字一直在大幅度下降，华尔街的老板们把市场炒得过热，才导致大崩盘。与所谓的贸易赤字相关的是一些人所宣扬的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其实，这些债务中有一半是外国人持有的美国公司的股票。在一个已经没有什么美国经济的全球性经济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10% 的股票，由曼彻斯特的一位英国人持有，同由威奇托的一位美国银行家持有，又有什么真正的区别呢？因此大可不必为此担心。

所以，《2000年大趋势》的两位作者断定：所谓的美国衰落论未免与 80 年代美国的实际情况相反，可悲的是，许多美国人却接受了这一结论，美国学术界中也有许多人甚至不加掩饰地对此津津乐道。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也针对保罗·肯尼迪的美国衰落论，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该书

承认：毫无疑问，美国在 20 世纪末已经不再像本世纪中叶那样强大了，连最保守的统计也表明美国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frac{1}{3}$  强下降到了 80 年代的  $\frac{1}{5}$  略强。但该书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的衰落，这不过是“二战效应”的作用。美国与其他大国不同，它是由于战争而强盛起来的。它没有遭到轰炸和入侵，却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而卷入大战的其他国家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美国的经济优势在 50 年代显得特别突出。然而，美国就像一个在其他孩子患流行性感冒时在街上称王称霸的男孩子一样，当其他国家的经济恢复健康时，美国的优势就势必要逐渐消失。另外，美国当时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政策，也必须使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由于美国在 50 年代后出现的相对衰落现象很多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人为效应向正常情况的转变，因此美国竞争委员会发现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 23%。而且 80 年代美国在主要西方工业国家的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还略有增长。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根据反映不同货币购买力的数字得出结论说：美国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百分比由 1975 年的 25% 略增加到了 1988 年的 26%。这些与关于美国正在急剧衰落或者持续衰落的观点大相径庭的研究结果证明，“二战效应”持续了大约 25 年后消失了，美国的衰落在 70 年代中期开始稳定下来了，不再下降了。

该书就此抨击了保罗·肯尼迪等人的观点，说：保罗·肯尼迪在他的畅销书《大国的兴衰》中写道：军事投资过多曾经影响过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当代类似情况的国家所遇到的困难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而已。这种历史类推的目的在于暗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做出重大的调整，减少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政治学家戴维·卡列奥还把美国的财政赤字归咎于军费开支相对庞大，建议美国从欧洲撤军，有选择地把核武器扩散到盟国手中去。这种历史类推不但有失偏颇，而且

结论也是错误的。美国实行收缩政策还为时过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行这类政策本来是为了避免美国力量的削弱，却反而会导致美国力量的削弱。因为减少美国的国际义务，一方面会削弱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另一方面却不见得能使美国国内经济得到加强。此外，世界各国的关系如今已经变得如此密不可分，美国想从中抽身将是十分困难的。

那么，美国在90年代能否领导世界呢？该书写道：根据霸权演变和帝国过度扩张的理论，强国被削弱主要是由于要保护其铺得太宽的利益范围所致。强国在国际上承担的义务榨取了它的国内实力，而崛起的挑战者却由于公共秩序、全球经济增长和强国的技术扩散而大受裨益。逐渐，强国将被某个崛起的挑战者所取代，这个挑战者可能是一个军事对手，也可能是它以前的盟友。但是这类理论以及伴随着这类理论提出来的一般性历史推论，并没有准确地刻划出美国在20世纪末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对比：

第一，从基础资源力量上看，虽然中国在人口方面居世界第一，美国居第四；中国在领土方面居世界第三，美国也居第四，但是中国由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比较低等问题，要想充分调动蕴藏在这些基础资源中的潜力却需很长的时间。

第二，从军事力量的角度看，在核武器、军费开支总额以及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部署到遥远的地方的能力方面，美国仍然占主导地位。现在太空中有近一半的商用卫星是美国的，其余大多数属于深受美国影响的国际卫星组织。如果像某些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国家对空间的有效控制将导致国际范围内的霸权主义”，那么，美国在空间资源方面的领先地位对于建立美国领导权就显得意义重大。

第三，在经济实力资源方面，美国面临着的主要挑战是日本的崛起。按照官方的汇率，日元由于比值升高而使日本上升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并使日本在人均收入方面显得比美国还要富有。但是，如果按照在不同国家中的硬通货的购买力来进

行比价兑换，那么日本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80%，德国的94%。它所超过的只是英国、法国。

第四，在技术资源方面，美国、日本和欧洲扮演着主要的角色。1986年美国在高技术出口方面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比重的21%；日本居第二，占20%；联邦德国居第三，占16%；英国居第四，占9%；法国居第五，占8%。

第五，从传统力量资源总体上看，在人口、领土、国民生产总值、制造业技术、高技术出口、商品出口、核武器、军费开支、兵员这9个方面，美国在国民生产总值、制造业技术、高技术出口、商品出口、核武器这5个方面均居第一，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日本和欧洲在基础资源和军事资源上不能名列前茅，中国在经济和技术的力量资源上未名列前茅，而苏联则处于捉摸不定的解体状况中。

第六，美国的文化也是一种力量资源。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就会自愿地接受并认同其价值观和选择。美国因为其使用英语语言、在科学和艺术上处于领先地位以及对外国人相对开放而受益匪浅。这点可以从来美国受训的外国学生的数量，为寻求庇护而流入的资金，以及每年进入美国的50多万合法移民的情况所证明。

第七，国际性机构和准则是另一种潜在的实力来源，特别是当它们以符合占主导地位国家意愿的方式来规定别国的选择时更是如此。美国加入了许多国际性机构。这些机构的规定和准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因此它们的作用在于帮助美国传播和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在诸如布雷顿森林会议机构这样的国际机构中，美国所拥有的投票权仍足以使它们行使否决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美国拥有正式赋予的否决权。虽然近些年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左右其他国家意志的能力已经减弱，但是这一机构还是常常在迎合美国的意志，否则，美国就会行使否决权。